

退出、呼籲、忠誠：

## 一個城市基層選舉參與效能與政治行動的分析模型

蔡儀儂\*

### 《內容摘要》

檢視中國城市選舉參與現況，若干學者，皆提出諸多論辯，但對於解釋個體行動因素及心態轉變，卻相對有限。客觀而論，當前推動的城市基層選舉，多是由國家主導，以城市民主政治建設做為號召，旨在喚回社區認同；但另一方面，伴隨選舉活動帶動的有限政治開放，其後續卻是難以預料。本研究據此出發，提出一個微觀城市基層選舉參與的效能與行動的分析模型，我們認為，兩種政治效能感「認同性」與「防禦性」組合配套，通過選舉產生的制度效應，將產生「退出」、「呼籲」、「忠誠」三種迥然相異的政治行動選擇。針對此一假定，本研究以上海 2006、2009 年兩次居委換屆選舉為研究個案，根據田野發現，社區基層選舉存在著普遍的「集體行動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高認同政治效能感個體由於選舉失望走向從「退出-呼籲」的行動替代機制，與現存集體行動理論預設大異其趣，卻是解決困境的唯一契機。就此觀之，中國的基層民主治理，或許會是面臨集體行動困境之後，走向突發轉折的非預期性後果。

關鍵字：政治參與、基層治理、中國政治、選舉、政治行動

---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 壹、前言

展望當前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自 1990 年代末期以降，伴隨著農村鄉鎮基層選舉的擴張，城市基層選舉日漸突破、逐步擴散，而走向發展的另一階段。與之相應，基層選舉的突破點，使政治參與日漸走向城市，走向社區，成為城市居民最直接參與的政治管道。就此，官方以「差額選舉」與「秘密投票」、「城市社區民主政治建設」作為號召，擴展基層居民委員會的直接選舉，換屆選舉漸步在城市大規模展開落實（左志堅，2006）。由此展開的發展論辯，參與帶動，及可能帶來的非預期性後果，日漸為學界所關注（李凡，2006；林尚立，2003；桂勇等，2003；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客觀而論，當前城市基層選舉的迫切，來自於基層治理機制落實「社區治理」、「社區建設」的需求，其目的在重整稀缺的黨國資源及渙散的管理體制，以圖「找回國家」、拿回對社會的日常建制能力(Mann, 1988; 1993)。另一方面，此種參與機制的釋放、及其對基層治理機制兩者互塑可能帶來的轉變，會對基層民主帶來何種轉型前景，是符合發展促轉的理論期待，抑或是政權維穩的強化統治根基，而頗值關注（Gilley, 2004; Nathan, 2003; 吳玉山，1998；耿曙、陳奕伶，2007；2008: 199-201）。

本研究由此出發，聚焦城市居民選舉參與的心態與政治行動的探討，並嘗試透過建立分析模型，解釋參與者的心態偏好與行動選擇，以提供一個較佳的工具。研究者認為，當前對於選舉參與效應的相關論辯皆有不足，忽略個體選擇偏好的深層機制。另一方面，對於參與者的退出政治參與及採取政治抗衡的手段，事實上都過度偏向「宏觀的結構面詮釋」，並沒有從微觀（即個體）理性出發，解釋宏觀（即社會）的集體選擇。與之對照，現存關於參與效應的論辯，桂勇（2003）等人提出「推銷民主」的看法，認為基層選舉的高度行政化，為基層社區建設「買單」的作法及動員選舉特性，由於參與者只有三分熱度，終走向參與動機低落的困局。若干學者則寄望「社會資本」，認為社區「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 Read, 2003b）鄰里網絡的轉化，會帶給社區「賦權」（empowerment），激起參與意識，走向認同轉向的抗衡結果（Read, 2000; 2003a; 孫立平，2001；劉春榮，2007）。

就此，研究者並不否認上述見解，城市基層選舉最終會走向強化治理機制與政治建設，或是走向社區自主性浮現而抗衡的兩種論辯，是我們要預測的結局，但卻不完全是我們要解釋現狀的「全貌」。根據研究者於2009年的田野調查發現，社區基層選舉參與者的心態，及參與行動，事實上呈現極為混亂多元的狀況，這使我們在理論預設難以完全解釋，必須回歸到微觀，而能解釋個體行動的機制。本研究由是出發，在研究取向採取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聚焦於微觀個體，關注微觀在面臨選舉的制度效應(institutional effect)，這些分析單位構成的集體現象。而微觀行動選擇的動機，我們假設其行為受到「自利」思維所影響，因此是種「動機-行動」

的研究途徑。就此，我們在動機方面，透過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的政治態度概念進行蠡測，並提出兩種政治效能感的次分類：「防禦性」與「認同性」<sup>1</sup>，對選舉參與的政治心態進行解釋。現有政治行為研究顯示，選民的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行動，可謂息息相關（吳重禮、湯京平、黃記，1999；陳義彥、陳陸輝，2002）。政治效能感是蠡測選民參與政治影響力，及政府回應性主觀看法的測量概念。就本研究角度，我們將此詮釋個體在參與「效益」上的心態衡量，而能與具體的政治參與行動產生連結。在選民可能採採的政治行動選擇，我們提出了「退出」(exit)、「呼籲」(voice)、「忠誠」(loyalty)三種手段。<sup>2</sup>總結上述，這種選舉參與的「效益-行動」分析模型，將使個體選擇更為清晰，我們由此亦較為推斷城市社區群體現象的背後微觀因素。

本研究以大上海地區為研究個案，研究資料則透過研究者 2009、2010 年隨同政治大學基層治理團隊的居委會換屆選舉田野調查取得，並參照部分 2006、2007 年的換屆選舉資料進行補充。在田野資料及訪談對象選取上，本研究雖然集中單一社區居委會換屆選舉的過程作為觀察驗證，而可能出現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 King, Keohane and Verba, 2001: 129-137)，存在抽樣無法涵蓋全體的疑慮。但基於下列原因，應不致影響研究效度。首先，本研究專注於少數個案，目的本在闡釋分析模型，並展望其驗證效用之可行性。而研究結果，只重其啟發處 (heuristic)，並不欲作擴張解釋(Eckstein, 1975: 85; 1992: 124)。其次，就「比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method)的角度，本研究符合在非隨機少樣本的情形下，有意識挑選(intentional selection)因果同質性個案的研究策略(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本研究之後的論述將分為四個部分。第二節將透過文獻鋪陳，構建效能感與政治行動的「形式模型」(formal model)，並據此提出四項假說(hypothesis)，待後續驗證。第三節則透過 GR 社區案例的居委會換屆選舉過程，觀察驗證四項假說。

。第四節則聚焦「高認同性」效能感的參與個體，何以在經過選舉失望後，會走向政治「退出」，並接續拈出解釋機制：過程失望浮現的「從內部退出-到外部呼籲」的政治行動轉變，進行探討。第五節的結論部分，我們嘗試回到最初的命題，城市基層選舉的開放，究竟會為當前的基層治理機制帶來何種轉變。就此，我們試圖與當前基層「集體行動困境」的論辯進行對話，及對照本文論點的「退出-呼籲」機制帶來現存理論可能的修正，探討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的意義所在。

---

<sup>1</sup> 具體概念定義，請參照本文下一章。

<sup>2</sup> 這三項參與行動的原始概念，出自 Albert O. Hirschman(1970)。

## 貳、效能感與行動的基本假定

在本節形式模型的建構，我們將首先針對兩種效能感：「防禦性」、「認同性」進行概念定義。次而我們透過兩種效能感的分類組合，分析可能選擇的政治行動，結合成一分類模組，提出四項研究假說，留待下節案例驗證。

### 一、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分類：「防禦性」與「認同性」

就比較政治的研究基礎，政治效能感與一個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基礎息息相關（Almond and Verba, 1963; Easton, 1975、1979; Easton and Dennis, 1969）。Almond 與 Verba（1963）的跨國實證研究則顯示了政治效能對於政治體系公民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程度決定的重要意涵（Craig, 1979: 229; Lane, 1959: 149）。按照過往政治行為研究文獻的定義，政治效能感涉及了參與者自身政治能力的主觀認知，尚包括了自我對於政治決策過程影響，及政體回應偏好及程度的評估（Abramson, 1983: 135; Balch, 1974: 24; Campbell et al., 1954; Campbell et al., 1960; Lane, 1959: 149）。就本研究角度，我們在此將政治效能感視為選民衡量進行基層選舉參與，政治影響能力程度的「效益」評估。他事實上涉及了選民對於自身的選舉參與過程，及採取的可能政治行動的「利害計算」。

正如前言所揭示，我們將基層選舉參與的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劃分為兩種類型：「防禦性效能感」與「認同性效能感」。這兩個概念，在自我所能採取「政治手段的影響能力面」，以及「政體應有所回應的偏好面」，有極大的不同。<sup>3</sup>簡言之，這可以說是行為者對於兩種不同效能感的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個人的參與動機及回應需求，在影響下一步的政治行動採取上，會因效益心態的優先選擇有所不同。以下，我們首先茲說明這兩種類型的差異。

#### （一）防禦性效能感

過往中國基層政治參與研究曾顯示，政治功效意識可能是鼓勵選民進行非黨國偏好人選的重要因素（Shi, 1999）。Chen 與 Zhong（2002）則認為，選民的投票行為雖然具有政治服從的特性，卻仍透過選舉過程，選民操作了對政權不滿與公民不服從的異議情況。這種政治參與及投票意願，參與心態卻與黨國服從者極為不同的參與群體，提供了發展防禦性效能感概念的可行性。進一步而言，我們將防禦性效能感定義為：行為者認為採取法規面程序的防禦手段影響政治，會較

---

<sup>3</sup> 上述界定，我們參了考 Lane(1959: 149)的定義，政治效能感有兩個成分，一是人民認為自己是有影響力的，另一個則是人民認為政府應該有所回應(Abramson, 1983: 141)。Balch(1974: 24)則依照 Lane 的說法將政治功效意識區分為「內在功效」(internal efficacy)以及「外在功效」(external efficacy)，前者包括個人認知政治事務了解政治過程的程度；後者則是公民認為政治權威對於其試圖影響政策是否會予以回應的程度（轉引自吳重禮、湯京平、黃紀，1999：25；陳義彥、陳陸輝，2002）。在本研究，我們試圖在兩種效能感的概念界定上，盡量能涵攝傳統政治行為研究見解，避免出現嚴重的概念扭曲(conceptual stretching, Collier and Mahon, 1993)。

為有效，達到政治期望；及體制及執政當局應對個人權利保障的需求，有所回應。

## (二) 認同性效能感

觀察現有城市基層選舉參與文獻，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存在著高度的黨國動員，及支持性的選舉參與（Read, 2000; 2003a；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劉嘉薇，2006）。若干研究則認為，這種動員性的選舉參與，對於城市居民的參與心態，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影響（桂勇等，2003；劉春榮，2005；2007；熊易寒，2008）。耿曙（2008）等人則指出，這種有限政治改革下的動員式參與，仍然將誘發高參與群體的參與動機浮現，及政治效能感的提升。研究者個人在 2009 年上海市居委會換屆選舉的田野資料，則發現表態黨國支持的參與群體，並非完全受到黨國被動動員，而是在個人參與心態及影響政治的信心程度上，具有一定主觀立場；在選舉過程的參與手段上，也極為熟練。<sup>4</sup>進一步而言，可以說是具有黨國認同的主觀效能感認知，我們因此認同性效能感定義為：行為者認為表態黨國認同的政治作為影響政治，較為有效；同時，黨國偏好立場是符合公益的，體制及執政當局會為公眾優先的需求，應有所回應。必須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個人認同效能感的上升，反映的是對執政當局的認同，這種高度認同反映的是黨國支持，黨國是公眾/群體利益的代表者，對於黨國的支持會「極大化」公益的實現。

總結上述，「認同性效能感」與「防禦性效能感」反映了公民影響政治認知的動機差異，我們毋寧可以說是由於「公眾優先」與「私益取向」的關注層次不同，在期望政府回應程度上，對於政府必須達到的優先偏好，以及滿足需求有所差異。在認為就有效的政治手段面上，「認同性效能感」會認為表達黨國認同、灌輸政治忠誠的手段，可以達到較多回報，也較符合公眾權益；「防禦性效能感」則認為採取程序面、法規面的政治手段，會使自我的政治異議得到更多關注，採取這類手段的動機，則可能源自對於自我權利維護的渴求。

此外，必須要補充的是，行為者個人可能同時存在兩種效能感，這兩種效能感會由於個體心態差異，高低而有所不同。本研究觀察的，除了這兩種效能感在個體出現的升降幅度外，更關注的兩種效能感在個體的排列組合，所形成在心態上「選擇性偏好的次序」，對下一步政治行動的影響。在下一節，我們將透過模型設計，進行更具體的設定及假設。

## 二、效能與政治行動的分析模型

正如前言揭示，本研究採取行為研究「心理-政治研究途徑」(psycho-political approach)的分析邏輯，提出研究假設：經過選舉過程，「政治功效意識」的兩種優先偏好的歧異性（自變項）會轉變成不同「政治行動」（依變項）。簡言之，個體政治行動的「退出」、「呼籲」、「忠誠」選擇，受到效能感的偏好所影響。

---

<sup>4</sup> 訪談記錄：c01、c05、c07、c08、c12。

為了將上述假設易於形式化(formalize)，我們將兩種效能感：「防禦性」與「認同性」設定作二元變項(binary variable)，分別存在「高」、「低」兩種情形，個體在效能感配對上，形成兩兩組合的四種效能排列分布。他們分別是：「認同性-高，防禦性-高」、「認同性-高，防禦性-低」、「防禦性-高，認同性-低」、「認同性-低，防禦性-低」的四種選擇，個體同時指會存在一種效能感的組合，因為在理論上個體同時保持對量兩種效能的高度情況，是不可能的情況。而「認同性-高，防禦性-高」的「雙高」情形故由於在概念上彼此互斥，因此不予納入。<sup>5</sup>我們可將此視為政治行動者是在針對兩種效能感的「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當一方效能感壓過另一方時，個體將以該效能感作為優先的衡量。上述三類的效能感排列分布的偏好排序，涵蓋了個體所有可能會出現的效能感分布情況，在推論個體面臨選舉制度效應，反饋的政治行動上，更具可預測性及解釋的邏輯(the logic of explanation)。以下，我們將這些排列分布，可能會出現的政治行動進行預測，形成四個研究假說(hypothesis)，以待後續觀察驗證，如表1。

表 1 政治效能感與政治行動的分類模組

政治效能感		認同性	
		高	低
防禦性	高	X	防禦性高，認同性低 <b>政治呼籲(Voice, 1)</b>
	低	認同性高，防禦性低 <b>(達標)政治忠誠(Loyalty, 2)</b> <b>(失落)退出政治(Exit, 3)(選後)</b>	認同性低，防禦性低 <b>不入政治(Exit, 4)(從頭)</b>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我們進一步說明表一：首先在假說 1：我們假設，「防禦性高，認同性低」效能感的個體，由於選舉過程無法滿足個別權益的需求，會走向政治呼籲(voice)，這種呼籲可能包括了體制內的政治抗爭，甚至是體制外的過激行為。我們預設的是，個體認為個別利益維護的迫切需求，選舉本身的制度作用必然完全無法滿足，這使得個體必然走上激烈的政治行動，以喚起當局關注。在假說 2：我們假設，若「認同性高，防禦性低」效能感的個體，經過選舉過程若是達到政治滿足，會達到政治忠誠(loyalty)。在假說 3：我們假設，「認同性高，防禦性低」效能感的個體，若對選舉過程感到「失落」，則會退出政治(exit)。假說 2 與假說

<sup>5</sup> 之所以將「雙高」稱作在概念上彼此互斥是因為個體在影響政治手段及所欲回報必然有所偏重。舉例來說，雖然個體固然可能同時存在「公益」與「私益」的滿足需求，在實際的政治行為的效益評估上，必然有所偏好排列，而效能感這種政治行為分析，正是對於個體效益評估最為敏感的測量工具。同樣的情況，在「雙低」的情形，則可詮釋為對於「公益」與「私益」的滿足需求已完全不抱任何期望，在既有的政治行為測量上卻是極常見的情形。

3 預設的是，選舉被個體視為政治支持與公眾利益表達的制度管道，當條件被予以滿足，個體會呈現政治忠誠，反之則會退出政治。在假說 4，「認同性低，防禦性低」效能感的個體，等同於高度的政治失望，因此對選舉完全不感興趣，而不入政治(exit)，這反映的是，在實證上城市基層選舉參與，參與意願高度低落的群體。

綜上所述，我們透過效能感與政治行動的分析模型，提出了四項可驗證的假說，我們將於後續基層選舉參與的實證觀察進一步說明。

### 參、觀察驗證：上海市 GR 社區

在本節，我們透過上海市 GR 社區的基層選舉過程作為觀察個案。GR 社區的社區背景，可以說是政治集體性事件及組織化社會力量浮現的觀察場域，這類社區通常有著高白領、高經濟水準及具有政治參與意願、綿密關係網絡的社區性質。<sup>6</sup>但另一方面，GR 社區的基層選舉經驗，其居委會的選舉與治理機制重塑，卻又可視作黨國收攏、個別擊破，找回網絡及動員結構的典型個案（邱崇原，2006）。但研究者於 2010 年進行的田野觀察，則認為在這種選舉動員結構下，潛藏了微觀參與動機及政治行動選擇的深層機制。<sup>7</sup>質言之，採取接受動員、退出參與、或是網絡重塑的觀點，不完全能解釋這種「退出-呼籲-忠誠」的行動選擇。個體的選擇受到政治效能感配對所影響，當個體極大化前述的效益心態組合的利益時，在面臨「集體選擇」（選舉的制度效應）過程時，結果浮現卻是「個人理性下的集體不理性」（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Barry and Hardin, 1982）現象，「退出-呼籲-忠誠」不同的行動選擇正是表現這種集體不理性圖像的結果。<sup>8</sup>

回顧 GR 社區 2006 年居委會第一次換屆選舉的過程，也面臨諸多社區存在的選舉半開放窘境，由於上海市政府對於基層選舉「雙過半」要求的直選規範<sup>9</sup>，造成選舉過程的龐雜以及達標壓力，使得居委會選舉必須要在有限的力量下，運用最小成本去達成黨國意志。但社區黨政系統最後仍成功了重塑權力，形成有效的動員系統，瓦解了反對勢力。<sup>10</sup>進一步而言，這主要是黨政系統成功找回少部分黨骨幹分子，並透過日常社區活動的佈建、形塑小群體的內部認同，這種小群體的關鍵動員作用，使得黨國最終在付出極小的成本控制下，彌平各自盤算、未

<sup>6</sup> 訪談記錄：e1、e5、e6。部分背景資料亦參照政大基層治理團隊於 2006 換屆選舉的田野觀察。

<sup>7</sup> 本研究認為上述關於基層選舉參與及治理機制的各種見解，事實上蘊含對於如何解決社會「公共產品提供」與「集體行動困境」的各種理論典範預設，我們將會在結論進一步與其對話。

<sup>8</sup> 簡單來說，群體若為節省參與成本，必然會採取同一的政治行動，強化行動帶來的群體效益，使組織管理者難以忽視，盡快改革提生組織效益。但田野實證的多種參與行為卻否定了前述假定，Albert O. Hirschman(1970)的著作可視作反對前述看法的經典論述。

<sup>9</sup> 「雙過半」意指「社區登記選民必須過半，當選者得票率要過合格選民的一半」的選舉程序要求。除了選舉的程序性要求，基層黨政機構還必須滿足黨組規劃人選當選的「潛規則」條件，這對日常行政過程欠缺社區群眾互動基礎的黨政機構，是極為艱鉅的任務。

<sup>10</sup> 訪談記錄：s1、s5。

能成功整合的反對陣營，最終取得獲勝結果，使得黨國體制成功最終滲入基層。

11

但事實上，這微小卻堅實的鄰里網絡，卻在選後，出現鬆動的情形。按照研究者個人觀察，微觀參與群體的行為者，都是屬於「認同性高，防禦性低」效能感的參與心態，卻因為對選舉結果的預期不同，出現了後續不同的參與行動。研究者訪談的 G 老師，是屬於前述群體，在參與行動上仍對黨國保持政治「忠誠」，熱衷參與社區政治活動，對於選舉後續帶來的政治效應，並沒有太大的不滿。<sup>12</sup>相反的，與 G 老師極為熟捻的 Y 媽媽，曾是現任居委會主任當選的重要推手，卻在選後由於政治事務上的落差，而「退出」了政治行動。在訪談過程中，Y 媽媽曾表示：

小區存在很多事務必須解決，但業委會並沒有解決的方法，物業公司<sup>13</sup>的問題很大，社區停車位問題、大廈門面維護粉刷，卻沒有任何幹部願意好好處理。……對嘛，如果物業問題沒辦法解決，最終仍是要[上法院]。

諷刺的是，G 老師正是 GR 社區業委會的委員，就研究者的觀察，這些話 E 媽媽不曾在 G 老師面前表達。而 Y 媽媽與 G 老師的參與情況，驗證了本研究假說 2 及假說 3，「認同性高，防禦性低」效能感的行為者，會因為對選舉過程的「失落」與「達標」，有不同的政治行動。另一方面，研究者透過了 Y 媽媽的介紹，認識了社區的政治異議者 D 先生，D 先生屬於「防禦性高，認同性低」效能感的行為者心態，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並且有居住他國的經驗，作為私人企業電腦工程師，與黨國並無太大的瓜葛，對於各種選舉規則、及上訪機制甚至是法規運作，極為熟悉，也非常熱心參與社區事務，時常在社區的物業論壇發表意見。但他在黨國支持者的眼裡，是屬於「被拉攏」的對象，卻不是共同的夥伴。<sup>14</sup>我們可將 D 先生視作本研究假說 1 採取參與手段「呼籲」的行為者。

值得關注的是，D 先生跟研究者談到 2006 年居委會換屆選舉時，曾經有極為激進的反對力量，D 先生曾表示與他們有所往來，雖然認同其立場，卻不贊成其激進手段，D 先生自認為是不屬於任何一方的中立人士。但在 G 老師的見

<sup>11</sup> 研究者在訪談及收集田野資訊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說法是，GR 社區的居委會選舉，是由「六戶」為單位的鄰里核心網絡，發揮了廣泛的社區影響力，最終將現任居委會主任拱上。

<sup>12</sup> 訪談記錄：d7。

<sup>13</sup> 物業公司是負責社區公共設施維護的產權公司，諸如美化、整潔、社區停車位、公共用地維護等。這是中國城市居住環境市場化與新式商品房普及的結果，社區居民則作為業主代表，組成-業委會加以監督，並有權更換物業公司。

<sup>14</sup> G 老師曾跟研究者表達，D 先生是社區的異議族群。雖然在日常互動中，G 老師與 D 先生雙方仍維持良好的互動，但並未徹底交心。G 老師將 D 先生稱之為跟社區的「壞人」較為親近的人士，並跟作者表示：「你可以從那聽聽小區的反對意見，就聽聽唄，D 跟他們比較好。」事實上，所謂的「壞人」指的是在居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採取激烈對抗手段的社區反對人士，G 老師與該方極度交惡。



解下，認為這群反對力量是「壞人」、「手段骯髒」、「非理性」，甚至會在社區「抹黑謾罵」業委會都是居委會、黨機構的「走狗」。G 老師並認為，居委會換屆選舉很多人是「賭爛票」，為了遏止這群反對力量進入居委會。事實上觀察，整個選舉過程，正是少數核心的鄰里網絡，與阻擋這群反對勢力的進入，最終合縱連橫下的競逐。<sup>15</sup>我們由此可以發現，GR 社區居委會選舉事實上仍存在多數並無參與的群體，我們可將其視之為「認同性低，防禦性低」效能感的行為者，對政治參與沒有意願，「不入」政治（假說 4 驗證）。

總結上述，透過研究者的個人觀察，2006 年居委會換屆選舉的過程，究竟可視作黨國找回動員力量的佐證，抑或是有限選舉下，社區利益衝突下競逐導致的結果，仍尚待深究。但可以確定的是，在解釋微觀個體偏好及行動的選擇上，我們可以發現宏觀結構採取的制約作用是難以具備主動作用的，這與既往的假設迥不相符，現實情況是基層黨政機構的職能不彰，使得「認同性高，防禦性低」的行為者浮現政治失望，選舉的制度效應，反而使得社區的爭議性事件日漸浮現。進一步而言，會使「認同性」效能感的行為者，加劇期望回應與實質回報的落差程度。微妙的是，Y 媽媽對於社區的反對意見正是研究者在 D 先生訪談過程中所表達的，他甚至贊成 D 先生解決物業問題應採取法律途徑的看法，雖然他在一般日常的社區參與始終表達緘默，較不表達政治意見。這衍生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選舉過程失望浮現時，「高認同，低防禦」效能感的行為者，為何寧願選擇「退出」的政治行動，而沒有表達出「呼籲」的發聲。我們將在下章進一步深究。

#### 肆、選舉過程失望浮現的「從內部退出-到外部呼籲」機制

在本章，我們主要探討，在基層社區選舉參與呈現「高認同，低防禦」效能感個體，為何最終會走向「退出」的行動。就田野實證觀察，原本處於高黨國認同的個體，若選舉過程產生政治失望後，退出參與是極為典型的現象。<sup>16</sup>值得追問的是：「為何不使用抗議效果較強的「呼籲」，喚起更大的關注，達到改革契機；卻選擇抗議效果極小、維持靜默(quiescence)的「退出」政治行動，而等同毫無作為」。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假定解釋，由於「認同性」與「防禦性」的效能感差別，導致不同的政治選擇，本研究不排除這種看法，但認為個體選擇下政治行動，或許是經過一番取捨(trade off)，不得不然的有限選擇。在本節，我們嘗試提出另一種觀點：參與行為者的「從內部退出-到外部呼籲」機制。

---

<sup>15</sup> 在這個過程中，D 先生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居委會核心的鄰里網絡，正是透過各種日常社區活動，如邀請 D 先生參加「橋牌社」把他拉攏的較為親近，可以說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典型作法。訪談記錄：s1。

<sup>16</sup> 訪談記錄：c12、d11、s5

## 一、比較基礎：「認同性」與「防禦性」功效選擇的差異

由於參與心態有異，「認同性」與「防禦性」效能感個體的選擇偏好自然有差，預期回應亦有所不同。但值得關注的是，行為者效能感在選舉過程後，「失望」浮現，對於個體參與行為選擇造成的後果。Hirschman(1982)指出，「失望」(disappointment)是造成行為者出現「私人-公眾」參與循環的主要因素，他是「期望效用」與「實際效用」的落差造成心理失落感，而這種心理失落會造成行為者有不同的參與偏好。進一步來說，我們可將效能感的高低，視作為政治行為者期望得到的回饋，當期望與實際回饋產生落差時，將會使得參與心態出現轉變。以下，我們透過分析「認同性」與「防禦性」效能感期望落差作為比較基礎進行觀察。

首先，就抱持「防禦性」效能感的行為者，由於懷疑當局，期望不高，抱持自我優先立場，必然走向政治呼籲。防禦性效能感所欲期望的政治回報，在選舉過程本身的作用不會受到滿足，選舉的回應作用，與效能感要求的回應偏好有極大的差異。簡言之，選舉是作為公益性表達的制度工具，卻非達到個人權益需求可以滿足的效果。就田野經觀察，社區基層選舉常見的景象是，是抗議群體時常透過選舉過程的「走過場」、「行禮如儀」表達政治不滿，選舉活動時常成為異議分子進行抗爭活動的「表演場域」，但抗議群體本身並不期望是透過基層選舉達到政治回應，而是希望能夠得到上層單位更多的關注。<sup>17</sup>當這種期望心態本來就不高時，選後帶來的失望落差自然極小，不構成參與行動轉變的誘因。進一步而言，原本懷疑執政當局的心態，造成了行為者持續採取「呼籲」行動的結果。

另一方面，「認同性」效能感的行為者，在選舉過程若期望並未滿足，原本較高的期待心態，將會使他的政治行動從「忠誠」轉向「退出」。原本的黨國忠誠，與認同性的戮力報償政治手段，會使得行為者原本抱持較高的期待，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開放」的制度效應，與「防禦性」效能感的群體相較，認同性群體對於制度本身抱持較高的期望，認為能夠達到較高的滿足，但事實與期望卻造成極大的落差。我們在此借用 Hirschman(1982)的觀點：「在消費慾望強勢增長時期，人們對於突然能夠對支付起新的耐用消費品有極大期望，結果卻發現這些期望很少得到調整。」我們可將此視為「有限政治改革」(limited political reforms, 徐斯儉, 2004: 173-174; 桂勇等, 2003: 23; 楊敏, 2005)下有限選舉參與造成的政治失落。當消費慾望極高所購買的消費品無法滿足期望、達到標準時，消費者

---

<sup>17</sup> 按照研究者個人的田野觀察，抗議分子有意願出動進行「表演」的主因是有上級單位「在場」(如城市管理上層單位：街道辦、區政府)，且希望越多人圍觀。此種「表演慾望」並非建立在對於選舉過程本身的參與認同上，而是藉選舉場合表達體制外的抗爭手段。事實上抗議群體往往是社區選舉的「外人」，是被基層黨國動員網絡排除在外的，對於選舉涉入也不深，研究者訪談過的抗爭者甚至表示：「不清楚是有誰在參選。」在 GR 社區個案，被黨國支持者稱作「壞人」的反抗人士即是採取「過激的選舉行動」，最後反倒在鄰里網絡形成一股抗衡勢力板倒，但顯然地這些反抗人士一開始便對選舉本身抱有太大的問號，才會出現如台灣早期黨外選舉的激烈行為。訪談紀錄：c04、c05、d9、d11。

選擇的便是「退出不玩」。這種對期望落差效應極大的失望心態，又是否會是過激行為(aggressive participation)的鋪墊。我們將在下節進一步探討。

## 二、理論對照：組合呼籲與退出的難點

上節的探討使我們推演出本節假設，即在「認同性」效能感參與群體，出現退出之後，是否會走向呼籲的政治行動，這回到本章最初提出的問題：**為何行動者寧願選擇靜默的退出，而非抗議的呼籲？**在進入這個議題的探討前，我們必須回顧一下 Hirschman(1970)關於「退出-呼籲-忠誠」三種參與行動的討論。按照 Hirschman 的觀點，個體在面對參與組織(如：國家、企業、政黨等)的績效衰退時，「退出」與「呼籲」交錯的參與行動對刺激績效提升，會有極佳的效果，但是「退出」與「呼籲」的組合事實上極難運用，不佳的組合甚至對參與組織的績效恢復十分有害。<sup>18</sup> 另一個困境是，在一個組織之中，退出的參與選擇會顯著降低實施呼籲選擇的機率，事實上只有將退出機率完全排除，參與者才會選擇呼籲的手段，這是由於只有當退出機制不存在時，呼籲才會個體宣洩情緒的唯一選擇。就此，Hirschman(1970)對此種組合的困境有極為精闢的見解：

人們對一種抗議方式情有獨鍾，但其作用力度卻與日遞減；只是當人們痛苦地發現，慣常採用的抗議方式無力獨撐局面時，另一種方式才會步入軌道。

現實的情況是，行為者永遠會選擇偏好的政治行動，因襲不變，只有當這種政治行動邊際效益降到最低時才會查覺，結果是無論何種參與手段的選擇，可能都無法達到最適結果。

## 三、另一種「路徑的選擇」

在前兩節，我們分別從「失望」落差解釋「認同性」效能感行為者從「忠誠」走向「退出」的參與行動轉移，以及組合「退出-呼籲」的難點理解行為者單一行動偏好的因襲常態。在本節，我們嘗試透過前述討論，推論為何：**行動者寧願選擇靜默的退出，而非抗議的呼籲？**進一步來說，一個結合「退出-呼籲」的參與機制，真的是幾乎不可能的嗎？就此，參與行為者的「從內部退出-到外部呼籲」機制，可說是在浮現政治失望後，採取另一種行動模式的選擇。

---

<sup>18</sup> 這種情況在公部門必然得介入同時涉及私人與公共同時重疊的事務時極為明顯。舉個情況來說，公部門為了國家教育品質經營公立學校，當公立學校經營績效不彰時，家長最好的選擇是採取「呼籲」提昇績效(要求改善產品質量)，而非選擇「退出」轉學就讀私立學校(選擇替代性產品)。最適情況應是，家長不應選擇退出，當公立學校會受到「呼籲」提昇，並會與私營教育機構達到競逐。但結果卻是個體的有限理性下，導致了集體行為受到「偏好誘導的均衡」(preference-induced equilibrium, Shepsle, 1986)。關於組合退出與呼籲的難點主要探討，可參考 Hirschman(1970)。

## (一) 「忠誠」的作用

本研究認為，一個靜默的退出，有時會帶來呼籲更強的效果。在此，我們必須回到行動選擇背後蘊含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採取退出與呼籲的手段，取決於對組織參與付出的成本(Hirschman, 1970)。若回到田調觀察，上海市 GR 社區的個案顯示了，「認同性」效能感出現政治失望行為者，擁有較高的黨國忠誠，並在選後選擇退出了政治參與，而黨國忠誠，是他們不願撕破臉採取異議手段的主因。<sup>19</sup>我們可將此詮釋為，由於過往的「忠誠」(loyalty)參與，使得退出參與的成本較呼籲成本來的更高，與黨國網絡的藕斷絲連，造成難以退出的窘境。但也正因如此，忠誠者的退出威嚇，會帶來更強大的威嚇效果。<sup>20</sup>而在選擇政治行動的「呼籲」上，也由於「忠誠」作用，而不易做為使用手段，但當他們逐漸喪失忠誠作用、處於體制外時，採取政治異議的可能性卻也更高。<sup>21</sup>

## (二) 從「內部退出-外部呼籲」

承接上述，本研究認為 GR 社區個案，事實上是修正組合「退出-呼籲」難點的理論預設的「異例」(deviant case)。按照實證觀察，我們可以發覺 GR 社區前期由於半開放選舉的制度誘因下，重塑了動員網絡，群體找回黨國熱情。但社區宥於有限資源，及社區居委會做為「公共物品提供者」(public good provisions)，卻處於治理機制末梢而難以提供較佳的服務，具有黨國忠誠投入的「認同性」效能感參與群體受到期望落差。而另一方面，社區做為公共場域的「外部性」(externality)作用，使得當採取「退出」手段時，由於完全斷絕關係網絡是不可行的，難以置身於外，在日常參與故仍是「藕斷絲連」。<sup>22</sup>但也正如前節所述，忠誠者的退出威嚇，會帶來更強大的威嚇效果。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內部退出」與「外部呼籲」(退出後的呼籲)相結合的機制的見解，當對於黨國忠誠者，原本無聲靜默的「內部退出」帶有替代性的抗議效果，這種威嚇的過程將趨於漫長而常態化，更可能是外部抗議、激烈手段的前奏，為採取下一步手段的「呼籲」提供了可能性。導致了最終從「內部退出」走向「外部呼籲」的非預期性後果。<sup>23</sup>

---

<sup>19</sup> 訪談記錄：d11、s5。

<sup>20</sup> Hirschman(1970)對此有個極佳的詮釋，在忠誠者採取的威嚇手段的情況下，會加強外圍者採取呼籲手段的力量，給予組織更大的壓力。

<sup>21</sup> 這個推論，來自於 GR 社區的田野觀察，當忠誠者退出政治參與機制外時，會更有意願動機說服別人採取政治異議手段，這同樣符合行動偏好取決參與成本的假定，當行為者處於體制外，採取「呼籲」，是降低政治成本的較適選擇。訪談記錄：s1、s5、d11。

<sup>22</sup> 研究者在 GR 社區的田野觀察可以發現，這些退出黨政、居委會參與運作的行為者，仍與社區服務機構保持一定聯繫，他們由於本身就熱衷於社區活動，雖然退出政治之外，卻也仍跟社區主要群體維持互動的空間。

<sup>23</sup> 就此，Y 媽媽曾跟研究者表示，他認同並鼓勵部分表達「呼籲」政治手段的參與者繼續行動，社區爭議事務或許應透過上訪、法律訴訟才能解決。在此之前，事實上，Y 媽媽的退出行動正表示了，雖然仍與社區的核心鄰里網絡保持互動，卻不是完全贊成他們的政治作為。訪談記錄：d11。

## 伍、結論

本研究目的，一方面在於提出一個基層選舉參與效能感與政治行動的分析模型，提供解釋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的現況。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透過個案的觀察驗證檢驗模型的效用，並藉此「有限改革」的選舉參與的政治後果的觀察，回頭關照現存理論文獻對話，特別是基層治理的「公共物品提供者」(public good provisions)及「集體行動困境」(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的現存見解，作者在此拈出前文發展「從內部退出-到外部呼籲」機制概念，就此進行一些理論層次的反省。

### 一、選舉參與、功效意識與「社區」政治行動

關照現存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參與的研究基礎，思考城市社區選舉，可以發現基層選舉的改革出發點最初是由「社區建設」所展開（林尚立，2006：5-8；邱崇原，2006；陳映男，2005；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542）。國家為建設社區，強化治理基礎；由是發軔，參與展開，試圖形塑民眾「社區認同」。由此衍生出兩項根本問題：「社區」應如何聚合？民眾又因如何參與？最後又延伸出一個最終命題：民眾應與國家基層治理機制如何進行參與互動，國家又應扮演何種角色？

回顧現存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現存的制度性參與管道（居委會選舉）導致了不同參與群體高低截然不同的情況，選民的選舉參與浮現政治效能感上升、認同感由「國家-社區」轉變。客觀而言，城市基層選舉確實激起社區群體的參與熱情，出現了非預期的政治效應（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但另一方面，民眾的參與聚合、「社區」形塑，及社區基層治理機制與群眾參與，如何進行一個較佳的良性互動，仍尚待觀察。

本研究透過 GR 社區個案居委會選舉的田野經驗發現，這種良性互動機制仍尚待摸索，社區行動的參與者雖然存在高度的政治效能感，但在政治行動卻呈現「各有心思」盤算，值得注意的是，圍繞「社區建設」出發點展開選舉參與活動是徹底失敗的，在 GR 社區的參與情況最終導致了高熱情的參與者走向「退出」，外圍抗爭者持續盤算，對下階段的抗爭行為謀定而後動。這種驗證否定了前言所述，現存見解最常出現的理論預設，社區選舉並未帶動群眾參與動機下降，高度「行政化」與非「民主化」也不能完整描繪基層選舉的特性（桂勇等，2003；劉春榮，2005：124-129）。另一方面，認為社區選舉能形塑良好的社會資本，強化社區認同，為下階段與國家抗衡的準備，亦稍嫌樂觀（Read, 2000; 2003b；孫立平，2001；劉春榮，2007）。

中國城市的基層選舉呈現了某種情況的「參與困境」，參與者在制度環境不良的情況下，以有限理性進行了各種政治偏好計算。本研究因此認為，一個微觀個

體心態，推估參與困境所可能採取的手段的分析模型，才是解釋現存政治行動的較佳解答。我們透過兩種政治效能感的組合「認同性」與「防禦性」，分析個體在面臨選舉過程下，可能採取的政治行動。研究結果推翻了「社區建設」以及社區的群體參與聚合，會呈現良性發展的看法。在「高認同性，低防禦性」效能感個體，選舉過程失望走向「從內部退出-到外部呼籲」的行動替代機制，是典型的印證。這凸顯了現存社區基層治理機制，及民眾的群體參與間，欠缺良性互動的嚴峻現狀。

## 二、基層的「集體行動困境」與政治發展的「線性邏輯」

承接所述，本研究認為，環繞著「社區建設」及「選舉參與」展開的中國城市基層治理機制的論辯，質言之，尚涉及了「由誰來」提供「公共產品」及「集體行動困境」這個社會科學的經典命題。回顧過往的理論探討，舊有的典型見解認為，強化基層官僚的治理能力及公民社會監督(Dhal, 1971; O'Donnell, 1996)，是解決基層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方式。與之迥異，東方經驗的發展國家則顯示，透過「國家-社會」的「鑲嵌自主」(Embeddedness Autonomy)關係及公私協同的網絡機制(Evans, 1995; Lam, 1997)，會提供較佳的公共產品。就理論典範而言，Putnam(1993; 2000)認為社會資本的型塑及群體認同的「信任」機制，會降機訊息成本，是群體避免集體行動困境。Ostrom(1990)則認為良好的制度設計將避免公共資源耗竭的群體搭便車(free rider)情形。

就當前中國基層選舉的集體行動困境，我們可以發現，城市基層治理機制尚未形塑出良好的制度設計，並欠缺社會資本降低參與成本；另一方面，GR社區個案表現了，當黨國與社區基層走向互相仇視的情況，要實現東亞經驗的公私協同網絡的發展路徑，亦將極為困難。事實上，當社區問題浮現時，國家基層治理機制的芻弱，與社會網絡的欠缺聚合，都無法提供較佳的公共產品。這是否意味我們最終必須期待一個強大的社會力量，與之抗衡，雖是遺憾但可能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總結上述，本研究透過進一步的觀察驗證，可以發現受限於黨國忠誠心態，使得「退出」與「呼籲」的政治行動皆充面臨極高的行動成本，等同與執政當局最對，這是社區集體困境造成的主因。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選舉過程失望走向「退出-呼籲」的行動替代機制，反映的是「選舉本身」的制度效應，將會加劇參與者的失落感，當黨國忠誠者的「高熱情」、走向「高冷漠」的情況，將使得參與者更有意願表達不同的政治意見。就黨國忠誠者的角度，「退出」的低成本較「呼籲」的高成本來的風險更低，又能帶給基層組織一定的壓力。就當前而言，我們寧無法判定退出會是真正抗議的前奏，或者是長期的「緘默」。但不能否認的是，若「高認同」效能的參與者，走向真正的「退場」，將為外部抗議累積足夠的動機。參照本研究發現，在破除前述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預設後，「退出-呼籲」的參與機制，反而可能基層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方法。這似乎

也印證了中國政治發展，及民主前景的「非」線性邏輯，雖是匍匐前進，卻仍有轉圜餘地。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左志堅，2006，〈上海進行建國後最大規模的基層民主試驗〉，新浪網，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查閱時間：2010/1/26。
- 吳玉山，1998，〈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9: 443-464。
- 吳重禮、湯京平、黃紀，1999，〈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選舉研究》，2(6): 23-44。
- 李凡主編，2006，《2005 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北京：知識產權。
- 林尚立，2006，〈基層組織：執政能力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戰略資源〉，《理論前沿》，9: 5-8。
- 林尚立主編，2003，《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台北：社會科學文獻。
- 邱崇原，〈轉型中的威權政體：城市基層選舉與黨國權力重塑〉，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基層選舉研討會，2006年12月9日，臺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孫立平，2001，〈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育〉，《學海》，4: 93-96。
- 徐斯儉，2004，〈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載於《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林佳龍主編，臺北：時報文化。
- 桂勇、黃貴榮、李潔瑾、袁靜，2003，〈直選：社會資本還是行政推銷民主？〉，《城市管理》，6: 22-25。
- 耿曙、陳奕伶，2007，〈中國大陸的社區治理與政治轉型：發展促變或政權維穩？〉，《遠景基金會季刊》，8(1): 87-121。
- 耿曙、陳奕伶、陳陸輝，2008，〈有限改革的政治意義：中國大陸動員式選舉參與對其成居居民參與意識的影響〉，《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20(4): 513-552。
- 陳義彥、陳陸輝，2002，〈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2001年10月19-20日。臺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陳映男，2005，〈當單位遇見居委會：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治理體制的轉型〉，《東亞研究》，37(6): 157-182。



- 楊敏，2005，〈公民參與、群眾參與與社會參與〉，《社會》，2005(5): 78-95。
- 劉春榮，2005，〈中國城市社區選舉的想像：從功能闡釋到過程分析〉，《社會》，2005(1): 119-143。
- 劉春榮，2007，〈另類的鄰里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年度學術2007：治與亂》：374-39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劉嘉薇，2006，〈選舉作為一種動員—上海市居民委員會選舉之探析〉，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基層選舉研討會，2006年12月25日，臺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熊易寒，2008，〈社區選舉：在政治冷漠與高投票率之間〉，《社會》，2008(3): 180-227。

## 英文部分

- Abramson, Paul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CA: W.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lch, George I. 1974.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 (2): 1-43.
- Barry, Brian, and Russell Hardin, eds. 1982. *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Chen, Jie, and Yang Zhong. 2002.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s* 64 (1): 178-197.
- Collier, David, and James E. Mahon, Jr. 2000.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4): 845-846.
- Craig, Stephen C. 1979. "Efficacy, Trus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n Attempt to

- Resolve a lingering Conceptual Dilemma.”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7 (2): 225-239.
- Dahl, Robert A. 1961.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aston, David.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4): 435-457
- Easton, David. 1979.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aston, David, and Jack Dennis. 1967.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1): 25-38.
- Eckstein, Harry. 1975.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Strategies of Inquiry*, eds.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Eckstein, Harry. 1992. *Regarding Politics: Essays on Political Theory, Stability, and Change*.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ley, Bruce. 2004.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2001.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m, Wai Fung. 1997.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 In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ne, Robert E. 1959.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Glencoe, IL: Free Press.

- Mann, Michael. 1988.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 State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and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than, Andrew J. 2003.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 O'Donnell, Guillermo. 1996.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2): 55-69.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 Sons.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ead, Benjamin L. 2000.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Nerve Tips."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806-820.
- Read, Benjamin L. 2003a. "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rhood? 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a Journal* 49: 31-59.
- Read, Benjamin L. 2003b. *State, 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 Shi, Tianjian. 1999.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61 (4): 1115-1139.
- Shepsle, Kenneth A.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ed. H. Weisenberg. New York: Agathon.
-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